

目 录

绪 论	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说起	1
第一讲	唐宋变革期略说	18
第二讲	10~13 世纪中国经济运动的时代特征	34
第三讲	“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南宋立国态势和经济格局的变化	47
第四讲	从均田制到“不抑兼并”：中古田制时代的终结	67
第五讲	“不抑兼并”：宋代土地政策的核心原则	81
第六讲	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	100
第七讲	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的国家干预问题	122
第八讲	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	136
第九讲	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	156
第十讲	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的历史前提	171
第十一讲	两宋“摊丁入亩”： 我国赋役结构从双轨制到单轨制的演进轨迹	189
第十二讲	南宋义役研究	207
第十三讲	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	224

第十四讲 宋代经济评价的方法论问题	248
附 录	269
一、治学心得：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示要	269
二、主要著作	276
三、主要论文	278
后 记	283

绪 论

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说起

各位同学好！我的这门课程叫“宋代经济史研究”。我治宋代经济史将近三十年，多少有些心得。这门课程主要讲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自己发表的著作、论文，特别是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这些权威刊物上的文章，作为自己讲课的主要内容。我希望这门课程尽可能地保持知识方面的前沿性、观点方面的创新性；希望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希望在学术规范方面，也就是在学术前史的回顾上，能够肯定学界前辈在宋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为了便于同学们学习，我准备了一份讲课目录。本课程一共十四讲，每周两讲，讲完大概是七周多的时间。今天讲绪论，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说起，还要说到课程要求、课程内容。

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前史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再延伸到宋代经济史这个专门研究里面。中国经济史研究源远流长。大家是历史系的博士生、研究

生,学历最低的也是基地班的本科生,都读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在前“四史”里面,司马迁的《史记》里有《货殖列传》,有《平准书》,大家应该记得吧。《货殖列传》中怎么样说我们江南人的?说当前“三河”地方只居天下三分之一,但财富居天下三分之二。“三河”是天下的中心,视我们江南为“地势卑湿”、“丈夫早夭”、“饭稻羹鱼”、“披发文身”、“鸟语馥舌”之地。当然是这样一个情况,汉武帝的时候,我们南方比较落后。中国经济史是有传统的,《货殖列传》、《平准书》就是我们经济史的源头。那么先秦诸子里面有没有啊?有。《论语》里面讲“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是什么意思啊?不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有饭吃嘛。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不就是当年战国时代井田制瓦解,小农阶层兴起,要求每个老百姓最好能有五亩宅、百亩田,种两棵桑树、两棵枣树,小孩有零食吃,然后种百本韭、百本蒜,拌点盐,有点下饭的咸菜碟子。孟子讲,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有恒心啊。所以就经济史的源头来看,最早可以推到司马迁,但司马迁以前,我们的先秦诸子,我们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对经济史也是有所关注的。再到《汉书》。《汉书》中有《食货志》,“食”是什么东西啊?农业生产,生产粮食。“货”是什么东西啊?工、虞、山、海出产的各种各样用的东西。既有“吃”,又有“用”,老百姓有了“吃”、“用”,经济问题的大半就差不多解决了。从班固的《食货志》一直到《清史稿》,多数正史里面都有《食货志》。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的传统。

清王朝倒台前夕,梁启超先生在1905年就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新史学的标志,梁先生也因此成为新史学的前驱、先锋。新史学从原来的重事实变成重理论,了解历史所以这样发展的缘由;从重朝代到重国家,朝代是一姓之兴亡,国家兴亡、天下兴亡,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始,经济史作为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表现是,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创办了《食货》杂志,形成了以《食货》杂志为根据地的食货学派。后来陶希圣到台湾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了解得不多。以陶希圣为首的、以《食货》杂志为基地的这样一个学派,就是专门以经济史为研究方向的。第二个表现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然后在沈阳设立一个“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干啥的?它以经营南满铁路为主要业务,但是“满铁”附设了研究部,出于侵略的目的,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客观上为经济史研究做了基础

性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研究民国时代的东北、华北问题,民国时代的农业问题、商业问题、农民问题、金融问题,我们还是少不了“满铁”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呀?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里关键是要确定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于是又有一批人来从事传统中国经济状况的研究。遗憾的是,到了1949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史研究反而发展得不够快,当然也还有这方面的研究。大家知道,50年代、60年代,重点研究的是“五朵金花”。《五朵金花》是一部电影的名称,这里用以戏称50年代、60年代的历史研究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朵金花,是农民战争问题,从陈胜、吴广研究到朱元璋、洪秀全,这是一朵金花,一个主题。第二朵金花,是土地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生产资料——就体现在土地上。1952年,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展开,一举消灭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小农土地所有制。第三朵金花,就是古史分期问题,按照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篇文章收在《联共(布)党史》中——所讲的,人类社会具有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两个阶段。既然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那么中国学者就要找到,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哪个阶段,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哪个阶段,于是先有西周封建说,然后有战国封建说,又有秦封建说、汉中叶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隋唐封建说,各种各样的封建说都来了。第四朵金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第五朵金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里面讲到中国历史时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照样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949年以后,大家就根据毛主席的论述,到历史上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哪里。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呀?如果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就可以证明毛主席说的话是对的。所以1949年以后,经济史研究虽然还有,但不是重点,重点是“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每一朵都与当时的形势紧密相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紧接着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大业,强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了,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重心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那么经济史也就再次成

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再次热起来。经济建设需要搞清楚我们经济的家底啊,我们中国经济的状况啊、国情啊,我们需要找到历史上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实生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历史研究中经济史再次繁荣起来。当时在社会科学界大家戏称:经济学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什么都进行供给需求分析、成本收益分析。自行车怎么丢得这么快呀?用经济学分析:犯罪成本低,收益高。怎么中国经常有男人喝醉了酒回家去打老婆,最后老婆忍不住把男人给一锤子砸死了,女人被抓进去了呀?离婚成本高,所以不能够使这种无效婚姻解体。如果离婚成本降低,就不会这样了。正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也日益兴盛。

二、国际史学界重估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缘由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国内热了,在国际上也热起来。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 年到 2007 年,连头带尾 30 年,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的第五位,除了欧盟、美国、日本等,现在意大利、英国等传统大国的经济总量也比不过我们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突然崛起在亚洲的东方。中国的鞋怎么这么便宜啊?结果,我们在西班牙的鞋厂不得不关门,马德里甚至发生了把我们温州人开的鞋店烧掉的事件。中国的汽车业一直是落后的,这几年兴起以后,汽车也开始出口到国外,当然是低档车,便宜。在中国的汽车出口以前,中国的钢铁等重工业产品,也开始打入欧盟,打入美国。加入 WTO 以后,按照 WTO 的规则,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只有自由贸易才是财富得以涌现的一个制度环境,没有自由贸易,财富不会像这样大量涌现。财富大量涌现以后,中国大量出口,美国政府受到压力,要求反倾销。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二三十年间突然崛起,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呢?于是,1992 年美国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说中国经济的急速成长威胁到世界经济的运行,给发达世界造成了经济麻烦。再加上中国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秩序是个威胁。当然,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可笑的是,喊了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威胁论”以后,到了 2000 年,在

新旧世纪之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又兴起了一种论调,叫“中国经济崩溃论”。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听一听。

第一个例子: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一项专门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夸大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其中,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不是百分之七点八,而是百分之二点二。他还说中国经济是泡沫经济,是虚假的统计数据堆砌起来的。

第二个例子: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中国经济研究的权威人物,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梦》(*China Dream*),他在这本书中把中国的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4月1日,美国发行量非常大的《时代》周刊——它的影响非常大——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造假账?》,文章说中国现在已经“被虚浮的数字所淹没”,说中国经济是泡沫经济,GDP的高速增长是不可信的。

第三个例子:2002年,有一个美籍华裔律师,叫章家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说中国多少年来都是虚报、浮夸、大跃进,这些数据都不可信。他的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

西方学界从“中国威胁论”,几年时间就转到“中国崩溃论”,这两个极端相反的观点的背后有相同性。说中国经济威胁世界经济秩序,是对中国经济缺乏真实的了解;说中国经济完全是虚假的、浮夸的、数字堆起来的,正在崩溃之中,同样是对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缺乏了解。与其说这两种观点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都离真实的状况极远。

2003年,我在湖北大学作了一个学术报告,就是讲怎么认识西方学术界从“中国经济威胁论”转向“中国经济崩溃论”,怎么理解中国经济统计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我在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当然有虚报的部分,当然有浮夸的部分,因为中国的经济统计体系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我们历来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统计的办法,那就是各乡、各镇报到县,县里汇总以后再报到市,市里汇总以后再送到省,各省汇总以后再报到中央国家统计局。报到中央以后再来平衡这个数据,哪里有水分,扣掉一点。我们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这套统计体系。当然,改革

开放以后,我们也在采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通用的经济统计体系,那就是依靠抽样调查。我们国家统计局最大的编制,一个是城调队,一个是企业调查队,还有农村调查总队、居民调查队。国家统计局这么多人,光是企业调查队就有三千多人。由于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层层上报的统计体系,统计数字里会有虚报。但是,我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中也有缩水的地方。是哪些地方的经济数据缩水呢?主要是东南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福建,特别是广东。这一片怎么缩水呢?不是故意要缩水,是数字报不上来。坐大巴到广州,沿高速公路到深圳,在广深高速公路两旁基本看不到农田,到处是两三百人的小厂,鞋厂、塑料厂、皮革厂、箱包厂。再到钱塘江三角洲去看看,杭州、萧山、宁波、绍兴,农民住房一栋栋的都是小洋楼、小别墅。底下一层是工厂或小作坊,做鞋、做玩具、做鞋垫、织袜子,第二层置放产品,第三层住人。大多数农民现在都成了小老板、小手工作坊主、小工厂主。打工的是谁啊?打工的是我们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但浙江的税收收不上来。你问他销售了多少?今年有五百万吧?“哪里有五百万,我五十万都没有,我这个是小作坊啊。”你怎么查法?查不到啊。于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在1996年、1997年请了吴敬琏为首的一行经济学家去考察,考察浙江的民营企业,并问他们对策,这些民营企业的产量统计不上来,税收不上来,怎么搞法?考察组给他们出了个点子,很简单,要生产鞋垫、塑料泡沫、玩具,都离不开电,就看他们的用电量。每个月估计一个生活用电的平均数值,然后根据用电量来估计其产能和产量。电费里面就加上了税。浙江怎么这么富啊?藏富于民。苏南模式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而温州模式是以民营经济为主。温州模式战胜了苏南模式。在这种地方,它经济不是虚报,它是大量的缩水啊。经济学家告诉浙江官员,你每年用电多少,用电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你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增长了百分之十一或百分之十二,这是有经验可考的。你今年的煤炭使用消耗比去年多百分之几十,那GDP必定要上升到多少程度。

所以,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大量的数据统计不上来。外国学者讲的虚报的东西有没有?有,但是以中西部为主。国民生产总值缩水的有没有?也有,以东南沿海为主。这两者大致可以互相平衡。所以我的态度是,基本上相信国家统计局关于GDP增长数据的统计,因为这是有经验数据作为支撑的。每年粮食消耗多少,石油消耗多少,电力消耗多少,运输量多少,GDP就在里面。怎么可能石油消耗上升百分之二十,GDP却下降百分之十?

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务院下决心,2004年进行国民经济摸底,以2004年12月31日为限,看看到底用了多少工人、多少原料。2005年,国家统计局发表一个统计报告,结果国民生产总值,比2004年的统计数据多了两万三千亿。把国民经济增长率,2004年的九点八,调高到十点一,调高零点三个百分点。一落实到真正的微观层面,那个瞒报的就把虚报的给填了。

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的高速成长,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重新评估。国际上一批非常知名的学者,包括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他们开始重新评估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这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从汉唐宋明以来,就一直领先于世界经济。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才慢下来,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快起来。因此,中国经济的落后,也就是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样子。在此前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领先的。现在,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后,中国经济又恢复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本来就是长期领先嘛,最近一个短时间,一百多年才刚刚落后,现在又突然恢复增长势头,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中国现实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西方一批学者,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学者,进而重新评估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就向中国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国汉唐发展到什么水平、宋明发展到什么水平、明清发展到什么水平、民国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中国学者才有发言权。搞美国史,你美国人厉害,我中国人搞美国史不如你。搞中国史,应该是中国自己的学者居于领先地位。你美国人搞美国史,搞得比我们中国人好,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搞中国史、中国经济史,还搞不过美国人、欧洲人,这就不正常了。

历史是讲究证据的,我同样给同学们举几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美国加州大学彭慕兰——这是个美国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中文名字叫彭慕兰——写了一本书,叫《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divergence有“歧变”的意思,指的是原先某种道路,到了某种关键点以后突然不对了,原来朝东的变为朝西了,原来朝西的反而朝东了。所以我觉得翻译成《大分流》还是不够确切。彭慕兰在这本书里面说,在1820年以前,道光皇帝上台之前,中国一直在领跑。中国现在崛起了,有什么可奇怪的?中国在1820年以前就一直在领跑嘛,就这一百余年落后了嘛。而这个大歧变发生在1820年,当时世界有六大

经济区：中国、欧洲、美国、印度、俄国、日本。按照彭慕兰的数据，在 1820 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领先的，但是在 1820 年以后，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而其他的五个经济区，也就是欧洲、美国、印度、俄国和日本，它们的 GDP 增长率开始急速上升。按照彭慕兰的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传统经济在 1820 年以前，在道光皇帝上台以前领先的呢？彭慕兰主要是利用当前日本、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区域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是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用江南区域经济与英格兰区域经济相比，认为江南小农经济更加自由，可以随便转移资源，转移投资方向，劳动力也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我地少，那么卖掉两亩地，去当雇工；我家里只有五亩地，我农闲织袜子去。劳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中国经济在 1820 年以前，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机会成本低，劳力、资本、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发展速度快。这话有没有道理？我看有一部分道理。我们知道，中国的小农经济历来比较脆弱，死一头牛就麻烦了，冰雹把一茬庄稼打掉就麻烦了。但小农经济也的确非常坚韧，农民生活遇到麻烦了，派自己的儿子到山背后的舅舅家去借两担谷子，过了这个春荒，第二年又活了，说不定第二年迎来一个大丰收，还能买回来一头小牛犊。小农经济既脆弱又坚韧，比起西欧中世纪的领主经济、农奴经济，比起斯巴达的农奴制、古希腊的农奴制，的确更有活力。家里面栽上几棵树，长上几年觉得可以做椽做梁了，伐下来，在自己的破草房旁边盖一间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就可以娶媳妇了。不盖房子你的儿子就娶不到媳妇，就没法传宗接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啊。

第二个例证。同属加州学派的还有一位美国学者，叫弗兰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书的英文书名叫 *Reorient*，意为重新面向东方、重新转向东方。弗兰克认为，在 1820 年以前，世界上的白银，也就是硬通货，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他有具体的算账的数据，美洲产多少白银，五六万吨，其中百分之多少流入欧洲，欧洲里面的百分之多少又流入中国，百分之多少流入中亚，中亚里面的百分之多少又流入印度，印度里面的百分之多少又流入中国。按照他这么算下来，全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的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中国有如此大的硬通货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今天国际上都用美元嘛，美元是最主要的结算方式，

经常项目、非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贸易项目，都是用美元结算的。

弗兰克的观点和彭慕兰的观点有区别吗？有小小的区别。彭慕兰认为，在1820年以前世界是多中心的，并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多中心里面有六个经济板块：中国、欧洲、美国、俄国、印度、日本。但在多中心里面，中国是领先的。而弗兰克干脆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当时世界上生产的白银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不管有多少区别，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在1840年以前或1820年以前（还有的说是1850年以前）是领先的。

第三个例证。美国一个有政治身份的学者，名字叫麦迪逊，他是联合国国际经合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麦迪逊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什么叫实际购买力？就是购买力平价）计算，认为在1706年的时候，也就是康熙朝的后期，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把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大国都加起来，再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加起来，整个欧洲的GDP总值和中国的GDP是相等的。从1700年到1820年的120年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零点八五。今天来看这个百分之零点八五，怎么这么低啊？美国说现在经济衰退、经济紧缩，也要达到百分之二点二，调低到百分之一点七、百分之一点八。然而在这一百二十年间，欧洲的GDP年均增长率是百分之零点二一。我们是百分之零点八五，我们在这一百二十年间的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是欧洲同时期增速的四倍多。那时候中国正在什么时候？康雍乾盛世。这是联合国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麦迪逊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算出来的。什么叫购买力平价？不是说你有多少美元，他有多少美元；你有多少黄金，他有多少黄金。不是这样算的。算法很简单，就是这个国家生产多少粮食，那个国家生产多少粮食；你多少布，他多少布；你多少铁，他多少铁；你多少手工业品，他多少手工业品。这个粮食、布、手工业品是等价的，按人均占有的实际产品计算，这就是实际购买力，就是购买力平价。

好像是2005年吧，国际上吵得很凶，说按照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不是一千美元了，至少乘以五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不承认。没这么高，中国还很穷。日本就吵，说你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很穷，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当时也没有要我们赔偿，我们也是心存感激，每年给你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几百亿日元。现在，好啦，说中国这个学生已经毕业了。

什么意思？毕业了，就是说你已经学好了，富起来了，我们的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不准备给你了。我们中国人说，你不给我们也不要，给也是应该的。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中国在康雍乾盛世这一百多年，与欧洲相比，发展速度、GDP 的增长率要超过四倍。这一百二十年间超过欧洲四倍的经济增长率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导致中国的 GDP 在整个世界中的 GDP 比重从 1700 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大概是四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点四（接近三分之一）。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接近四分之一到接近三分之一；而整个欧洲的 GDP 在整个世界的 GDP 的比重，从 1700 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差不多是与中国相等的），到了 1820 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也就是四分之一强，跟中国的差距很明显。按照麦迪逊的估计，到 1978 年，中国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的比重，经过一百几十年时间，我们反而从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如果算人均 GDP，那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强。这是麦迪逊的估计，也就是在康雍乾盛世这一百多年，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欧洲，而且超过四倍。这是我举的第三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证。美国的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也客串了一回经济学家。他是政治学家，研究综合国力对比。根据保罗·肯尼迪的估计，1750 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主要指的手工业产值，是法国的八点二倍，是英国的十七点三倍；到了 1830 年，也就是道光十年，八十年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值只有法国的五点七倍了。大家知道，18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工业发展起来了。1750 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十七点三倍。到了 19 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因此在工业产值的比较上，我国只是英国的三倍。一直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 1858~1860 年，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和中国的工业产值持平。而法国虽然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打败了，但法国当时的工业产值只有中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四十。这是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一个推算结果。

举了这四个例子以后，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理解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经济学家高估中国传统经济的原因了。怎么把中国明清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这么高啊？速度估计得这么快啊？我们中国人感觉，明中叶以后朝政腐败，“三饷”加派，旱灾连年，李自成起义，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直到吴三桂叛乱的被平定，有四十年的战争。康雍乾盛世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也正是康雍

乾盛世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从一亿到二亿、三亿、四亿,到道光年间四点二亿。民国时候已经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了。这么急速增长的人口,反而把人均 GDP 拉低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粮食产量增加了,但很多老百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按照 80 年代中叶的经济增长水平,我们这么多人,这个经济增长率,平均下来也就是每人一天增加一个鸡蛋。我们的人口太多,基数太大。虽然总量上在发展,但是平均在每个人头上是在下降。但国外学者认为这一百多年,我们的 GDP 增长速度是整个欧洲的四倍,百分之零点八五对百分之零点二一。1978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超过了意大利,又超过英国、法国,然后又接近德国。因为现实经济的高度发达,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地在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经济,从汉唐以来的两千年都这么强大,那么当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其惊人总量,当然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正如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文版的前言里所说的:只要对世界经济进行客观的考察,就会立刻发现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我们这门课就是要具体解剖一个麻雀,那就是两宋经济。“主宰地位”,这是弗兰克对宋代经济的评估。宋代人口达到一亿,粮食亩产量达到两石或三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三个半在宋代。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马克思说中国火药的发明,轰开了中世纪的城堡;中国人发明的热兵器,射穿了封建骑士的盔甲;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传播了文化,使得簿记制度能够得到普及;而中国人发明的海上罗盘针,使发现新大陆、环绕地球航行成为可能。马克思对中国的四大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们还可以看看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说四大发明有三个半是在宋代,同学们说,我们知道三个是在宋代,一个是在汉代,葛老师怎么说是三个半在宋代呢?在晚唐以前,中国的造纸术只是软纤维,棉絮、树皮等,只有到了宋代,突然出现了宣纸、剡纸、徽纸、蒲圻纸等,纸的用途也各有不同。这是什么道理啊?宋代的造纸术有了飞跃的发展,宋代学会了如何把硬纤维软化,经过加碱、沤制,然后去掉硬纤维里面的那些杂质,把硬纤维变成软纤维。具体来讲,藤、毛竹就是硬纤维,先在河边用水磨粉碎毛竹,然后把它放到坑里面沤烂,加上一些化学药剂如碱之类将它泡软,从中提取造纸的材料。所以唐代以前很少有书籍保留下来,而宋版书就能保留下来。什么道理啊?宋代发明的如何软化硬纤维的技术,使中国的造纸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层

次：一是扩大了造纸的原料范围，硬纤维可以造纸；二是提高了纸的质量。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确认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一点也不新鲜。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它通过分析证明，至少到 1800 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 1800 年，具体到中国是 19 世纪 40 年代，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情。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ing, 重新面向东方)，中国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 1800 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再是中心地位。中国历来就是中心，不过暂时的这一百多年落后了。中国传统经济到底该怎样评价，现在已经不是国内的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国际的一个学术问题。

三、几点启示

从刚才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简要评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双螺旋结构。历史问题从来都是现实问题的投射，也就是说，现实问题热点的转移会导致历史研究热点问题跟着转移。用经济学的话来讲，现实问题是自变量，而历史研究跟着转，是因变量。所以我说，我们学历史的人，借用生物学的话来讲，这个知识结构必须是一个双螺旋结构的东西。基因不是个双螺旋吗？来自父系的，来自母系的，两对基因配起来。搞历史研究的人，知识结构也应该是一个双螺旋结构。一条线，是认真地阅读史料，要研究明代，要了解明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文化、人物、军事、民族关系，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对史料的阅读这两条线旋转起来，你的问题就来了，你的理解就加深了。由现实问题所激发的困惑去叩响历史之门，用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回过头来去加深对现实问题背景和发生土壤的理解。没有这个双螺旋结构，以为光靠读史料就能读出问题来，读出心来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有些人，史料放在面前，读一百种地方志，读十种《食货志》，读了半天，分门别类，读得非常细，这是盐的价格，这是粮食价格，这是布帛价格，那是土地价格，那是房产价格，做得非常细，但他看不出问题。做了好多

表格,不知道这些表格能说明什么。什么道理啊?他缺乏这种双螺旋结构,脑子里没有问题意识。我刚才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现状,从国内说到国际,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历史问题、历史热点其实是现实热点问题的一种投射,现实问题的转移会引起、带动历史问题的转移。

我长年以来给《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给《中国史研究》投稿,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投稿,摸索出一些经验来,不妨跟同学们一起共享。我为什么有的文章给《历史研究》发表,有的文章给《中国史研究》发表?我也是在“窥测”方向,也在揣摩着各个杂志不同的风格。《中国史研究》强调的是扎实的史料功夫,实证问题要求竭尽史料,一个问题再小,比如说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反映的土地价格问题,大量的文书引上去,它就给你发。但《历史研究》不同,《历史研究》不仅强调用史料说明问题,史料要扎实,而且强调提出的问题具有开创性。你抓住了别人没有注意的问题,然后你用大量史料去证明它,这样的文章就很有可能发表。所以你辛辛苦苦做了两年博士、做了三年硕士,做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土地价格,搞了十几份表格、几百个数据,这种文章《历史研究》不一定发,但《中国史研究》发的可能性大。你发现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同时有足够的史料支撑,这篇文章就不该给《中国史研究》,应该给《历史研究》。如果这篇文章既有问题意识,抓住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又有具体的史料支撑,同时这个问题又与当今现实问题有某种关联,或者是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总之有某种关联,这篇文章请你给《中国社会科学》。

第二,两条腿走路。史学研究在重视史料的基础上,一定要注意理论,要有理论思维,增加自己的分析工具。什么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史料要扎实。研究明代,要回到明代去;研究明代的民族关系,要回到明代的民族关系的具体场景中去。还有一条腿,就是要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最新理念。你研究清代的财政问题,请你读一读当代的财政学;研究宋代的外交问题,请你读一读当代的外交学;研究宋代、明清的货币问题、钱庄问题,请你读一读现代的货币学、银行学;研究汉唐的税收问题,请你读一读当代的税收学。没有史料不行,光有史料是死的,活不起来。怎么叫它活?一靠问题意识,能够把某一方面的史料给它串起来;二靠理论思维。

第三,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史学要发展,在座的各位同学要做出有分量的、有传世性的、有延续性的成果,史学成果要真正在史学界站住脚,就必须与国际

接轨。要与国际史学界进行互动,知道日本学者在干什么,美国学者在干什么,欧洲学者在干什么,澳大利亚学者在干什么。你如果能与国际史学界互动,能够用英文写一篇评论弗兰克《白银资本》的文章,抓住哪个问题跟他讨论,或者用英文写一篇评论彭慕兰《大分流》的文章,投寄到国内杂志发表或者是国外杂志发表,那你哪一天就有可能接到加州大学的邀请函,请你做两个月的访问学者。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过,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在国际上没有名气?为什么投到国外学术界的文章发表不了?关键是中国经济学家外语不好,他对国外主要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不是很了解,文章里面不引用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和观点,所以一审就“审”掉了。不是说中国经济学家的不重要,分析不深入,数据不充分,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投寄到国外的文章缺乏对国际上发表的经济学文章的引用,脱离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话语圈。这是应该得到的第三个启示。

第四,多学科协同作战。史学研究不能再故步自封了,认为抄点卡片、做点索引就完了。史学研究必须走出自设的藩篱,与社会科学做朋友。你研究经济史吗?与经济学做朋友。你研究政治史吗?与政治学做朋友。必须融会贯通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方法。你说“我”现在时间这么少,又要读古文,又要学外语,哪里有那么长时间啊?所谓融通,我不要求你又懂人类学,又懂财政学,又懂外交学,又懂货币学,又懂金融学。那到社会科学里面找什么?这要根据你的研究需要。你这一段在关注民族关系问题,你读一点民族学的书;你这一段在关注财政问题,你读一点财政学的书。一定要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做朋友,千万不要故步自封。陈寅恪为什么从国外留学回来,没有拿到任何一份文凭,回来在国内搞唐史,搞出那么大的成就?他在国外十几年,接受了现代西方学术的训练,他看出了关陇集团在隋唐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用文化的、种族的观念来解剖唐史,结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成了不朽之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成了不朽之作。说得夸大一点,今天国内唐史研究的框架,还没有突破陈寅恪所确立的框架。今天的唐史研究看不到一种新的框架可以与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史的框架相抗衡。

我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从国内讲到国际,是为了激发同学们对这堂课的兴趣。

四、课程内容和讲授方法

学习上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激发我们去寻求答案,而寻求答案的过程就是一个训练智力的过程。这种智力训练有一定的路径,有一定的规范。我在下面讲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具体课题时,会按照每个课题的特有状况,分别强调相关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本课程一共是十四讲,今天是绪论“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说起”。第一讲“唐宋变革期略说”,第二讲“10~13世纪中国经济运动的时代特征”,第三讲“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南宋立国态势和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三讲是宏观分析,可以作为第一单元。从第四讲开始,进入第二单元,讲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有制问题,按制度经济学来讲的话,就是产权问题。第四讲分析“五朝均田制”,讲中古田制时代的终结,这是讲产权问题;第五讲“试论‘不抑兼并’”,第六讲“北宋官田私田化问题”,第七讲“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讲国家土地政策的转轨问题。第三单元从第八讲到第十讲,主要讲经济结构。第八讲“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把产权问题和人身依附问题联系起来看;第九讲“从均田小农到无地客户: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是讲阶级构成问题;第十讲“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的历史前提”,前面讲中古田制时代结束了,结束以后进入什么时代啊?租佃时代。说战国就是封建社会,战国社会群体就分裂成地主阶级和佃农阶级,这种观点不对。佃农成为农民阶级构成的主体,到了宋代才是如此。第四单元包括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既然土地所有制关系变化了,经济结构变化了,那么,国家的赋役政策也变化了,户籍制度也变化了。所以,第四单元讲赋役政策。第十一讲“两宋‘摊丁入亩’:赋役结构从双轨制向单轨制的演进”,讲的是赋役演进过程;第十二讲“南宋义役问题”,讲义役的不同类型,用新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义役败坏的原因。第五单元包括第十三讲和第十四讲,再回到总体分析上来。第十三讲“原始工业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讲怎样用原始工业化理论分析中国的手工业兴起和市场兴起;第十四讲“宋代经济再评价”,不仅讲我对宋代经济的评价方法,而且要讲学界前辈的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方法。

这十四讲的逻辑关系是:第一单元是宏观分析,第二、第三、第四单元进入微观分析,从土地所有制问题,进入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再进入国家赋役政策、